



THE DEVELOPMENT WAY OF
POST-WAR ECONOMIC
America

世界主要经济体战后经济发展丛书

丛书主编 李炜光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

美国篇

董 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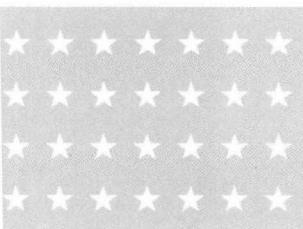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THE DEVELOPMENT WAY OF POST-WAR ECONOMIC America

世界主要经济体战后经济发展丛书

丛书主编 李炜光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

美国篇

董 磊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美国篇/董磊著. —北京：经济
科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 - 7 - 5141 - 1960 - 2

I . ①战… II . ①董… III. ①经济发展 - 研究 - 美国 -
现代 IV. ①F113. 4②F171.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0205 号

责任编辑：王冬玲

责任校对：苏小昭

版式设计：代小卫

责任印制：邱 天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美国篇

董 磊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37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1000 16 开 13.75 印张 220000 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1960 - 2 定价：3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成果之一，我以为首先不是GDP增长了多少和福利有多大的改善，而是计划经济这种发展模式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施政选项中排除，不是计划经济的设计本身有多大错，而是凭人类目前的智慧和能力做不到。从客观效果上看，这种集权型的经济体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损害也委实太大。尽管在一些转型国家，计划体制的思维仍在，体制仍有回潮的可能，但已构不成现实的威胁。

对于计划经济，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著作《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的概括是：“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的，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义的。”计划经济不相信自然演进，相反，它把各种资源和要素统统“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便经济体系能依照有目的的制定且合理协调的政府政策朝着其所要求的方向运动。”保罗·萨缪尔森甚至一再预言，苏联的计划经济将会超过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历史给出的结论却是，自由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加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繁荣和自由。计划经济的两个大本营——苏联和中国也都先后放弃了这个过于理想化的体制，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深刻反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得出的经验和结论。

战后世界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并极大地造福于人类，首先应归功于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联邦德国

只用了 10 年不到的时间，就将这个因战败而被彻底摧毁的国家建成欧洲大陆上最强有力的经济体，就是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奇迹。中东地区的以色列，虽然对经济实施了较广泛的干预，但因为保留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更多的政治自由，经济发展的情况就要比邻近地区的其他国家更好，如埃及。在远东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因广泛地依靠私人市场来发展经济而保持了长时间的繁荣。印度声称废除种姓制度的藩篱，在实践中却进展甚微，但那里还是成批地产生优秀的企业家，特别是政府管制较弱之处，他们成为促进这个难以进步的国家的推动力量。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形也大致如此，经济自由和人类自由的有无和空间大小，政治权力是不是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根本上决定着那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是繁荣，还是凋敝；是发展，还是蹒跚倒退。

尽管有长时间的市场经济实践，西方学界内部关于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问题的争论至今仍然辩驳不清。战后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综合起来看，实际上就是一段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相互碰撞的历史，争论主要也是围绕着这两种经济思想进行的。两大辩手哈耶克和凯恩斯分别给出答案，前者是个体自由的捍卫者，认为政府干预市场越频繁，对市场的伤害就越大，“政府应该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后者则认为，政府干预就像是给一部轰轰作响的机器加注润滑油，所以只有对市场进行有效干预，才能使它运转的更加良好。这场争论绵延甚久，改变政府过度干预的政策实践也颇费周折。2007 年以后，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轮番大战再度上演，甚至蔓延到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但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派并未明显占据上风。几十年来，各国国民收入中用于政府开支的份额一直没有明显下降，有的国家甚至还有所上升。如弗里德曼所说：“控制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政府管制活动，仍然杂芜繁多，并没有多少松动的迹象。”

总序

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为何如此不易呢？这是因为 2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全球经济严重倒退，给整整一代人带来恐慌。这以后，扩大政府职能的主张便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认可，也引发了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变化，其标志性事件是 1946 年美国《就业法》的颁布，联邦政府被赋予了更多的管理经济的职权，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产量，把农产品价格人为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在这以前，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体系常会发生运行不畅的问题，多数经济学家仍把这种波动归于正常范围，认为经济体系能够自我纠错，就像一个人得了感冒，依靠自身机体的抵抗力也能痊愈。人们产生这种自信是有根据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 19 世纪末的时候，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制度的严格限制，几乎不能集中起什么像样的作用，已威胁到普通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了。而到了 30 年代，仿佛一切又都回去了，国家建构的努力似乎白费，就像回放一部黑白默语片。

与众不同的凯恩斯，不认为经济体是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不能“自然而然”地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里去的。在他的理论推导中，自由市场经济就像一艘海面上行使的船，船舵已然出现破损，海风的吹打使它左右摇摆，已无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平安抵达彼岸。他给出的方案是，在经济衰退期，政府应该大规模借债以提升总需求，并在他的新经济理论中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是恰当的。他尤为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加大投资——架桥修路，或减税，或给家庭直接增加购买力，来提升对商品和货物的需求，进而引导企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用于分割的“大饼”是一成不变的，政府多支出一美元，居民就会少消费一美元。而在凯恩斯学派看来，当私人投资支出过低时，政府就应该用自己的财政支出来替代它。政府额外支出一美元，会把大饼做得更大，从而同时增加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美国篇

政府和居民两者的可支配收入。在“二战”早期的年代里，政府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扩张正巧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紧迫局面相合，凯恩斯的灵丹妙药促使经济体从低谷迅速反弹，失业率应声下降到历史的低位上，人均产出最终回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水平。这正是凯恩斯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这个理论并不复杂，但实用性极强，更主要的是，它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从来难以撼动的定论，并且影响深远。人们转而认为，大萧条的爆发是自由市场经济失败的结果，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丢弃了本属于自己的自由经济。公众和知识分子对政府与个人之间相对责任的认识最终改变了政治运作结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 1965 年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道：“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今，凯恩斯的影响力已远不如从前，但也不能否认，他们还有力量。

最近的一次争论发生在蔓延世界各地的本轮金融危机期间，如以往发生的那样，这一次的争论也渗入到政治领域的高层。2008~2009 年间，法国总统萨科奇、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仍在依据凯恩斯主义来解释政府债务大幅度上升的合理性，尽管在此前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理论的影响力已经有所下降了。在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和德国总理安杰拉·默克尔之间甚至发生了一次公开的争执，萨科奇坚持认为，如果经济陷入泥潭，大量财政赤字是可以接受的。在德国，2009 年 6 月通过了一项平衡财政预算的法案，企图将公共债务减少到零。美国的一些对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批评者则认为，政府并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问题本身。

凯恩斯主义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迷失了道路”。实际上，这一理论在战后就逐渐暴露出其缺陷。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因陷入越南战争而难以通过增税来获得财政收入，政府不得不依靠增加借债来支付军费。凯恩斯主义者的预期是，这些预算赤字将首先推动充分就业，然后引发通货膨胀。然而事

总序

实却是，赤字预算政策并没有推动失业率下降，它只是推高了物价水平。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9%，而通胀率则高达13%。这就是著名的“滞胀”，这种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与凯恩斯理论相矛盾。至少在整个70年代，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是失效的，其失败的方式与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数据是一致的。这是80年代古典经济学全面回归、由美国引领的全球性大减税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大萧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来维持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失业者则失去购买商品的能力。凯恩斯认为，总需求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但学者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消费行为的研究，发现这一假设是不对的。事实上，人们是根据自己拥有的财富水平来决定应该花多少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弗里德曼曾以他的研究成果向人们证明了这个道理：收入的暂时性波动对消费只有次要的影响，真正重要的是“永久性的收入”，即居民的财富。财富才是决定商品和就业数量的关键因素。当财富数值下降并较为长期地保持在低水平上的时候，居民就很可能削减自己的消费，于是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也就下降了。这个理论对于判断一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2008年以后，凯恩斯的“幽灵”又一次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上空徘徊，许多经济学家仍然相信恢复充分就业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观点引导着各国的各级政府一次次地大量举债，它所带来的高额成本，换来的只是一时的增长，却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或者说，相当于后世的税收都被我们这一代人“预征”了。

凯恩斯主义有问题，并不是说古典经济学就十全十美。当离我们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降临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对危机的形成原因和治理之道的解答，看上去是如此的无助和无力。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大选时说“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立即被奥巴

马抓住并受到其激烈抨击。麦凯恩所依据的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定义。然而他的话音未落，从这一年的秋天开始，经济就开始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下滑，并大量流失工作岗位，大批工人失业。实际上，在战后 60 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有越来越强的趋势，但战后出现的 10 次经济衰退都没有超过最早的那次大萧条，大多数衰退持续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年。如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波动的程度比战前小了将近 4 倍，可见，几乎完全忽略成百上千万投资者之共同信心的因素，以及过分相信市场自我修复的功能而排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古典经济学派面对经济领域新问题时所暴露出的缺陷。

尽管如此，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经济这两者中，我们最好还是选择支持前者。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理由，经济自由都比经济被干预要珍贵得多。政治权力不能高于个体自由，以平等的名义也不行。有经济自由才会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可保证人们之间相互合作，而不必依靠外部强制和命令，由此政治权力的领域便罕见地被市场所挤压，而变得相对狭小。其次，自由市场有把权力分散化的功能，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容易被其“化掉”而难以在人间兴风作浪。值得庆幸的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仍然是挽救人类的强有力的手，其力量还可以抵御来自政府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和社会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带来的恶果，只要我们坚持市场经济“100 年不动摇”。当然了，100 年以后更没有理由动摇。

经验表明，如果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中，则必然导致专制和暴政。一个一权独大为所欲为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繁荣，葬送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弗里德曼夫妇说，“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得多。”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人们也迟早会明白一

总序

个有关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最起码的道理：一个被权力过度管制的社会蕴藏着怎样的危险。多少个世纪以来，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并不是通常想象的战争和自然灾害，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人们总是受其所害，却总是不能醒悟。

不管怎样的难，人类总还是有能力找到一种既能纠正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弥补制度的缺陷，同时保留自由市场经济的长处的方案：既不限制个体自由和压制企业家创业与创新的热情，也不会导致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此为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两难问题，人们要获得答案，只有不断探索。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要比对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了解多得多，这妨碍了我们正确理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真谛，所以需要有人做研究和介绍的工作。

我的同事董磊所计划完成的这部《战后经济发展史》丛书，就是从战后国别经济发展史这个角度，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合理的政府干预的问题所做的有益探索。他是个有想法、有志向的年轻人，暑假在苏州一带旅行期间，他告诉我，为了写这本书，他每天要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材料汇总排列，对着它们冥思苦想，然后下笔写上几行。确实，战后近 70 年的历史波澜壮阔又丰富多彩，很多事件都极具启发性，都值得详加考证。由此可见他具备做学者的基本素质，那就是锲而不舍。如此坚持下去，我相信他必有收获，而且必有信仰蕴含其中。他一定会把事情做好的，所以我选择支持他。

李焯光
2012年8月19日

目 录

20世纪4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需求不仅将美国的制造业水平提升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更是刺激美国的科学家们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计算机，这使得美国独自带领世界完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而美国的政治家们，则依靠美国军事、经济的霸主地位为美国量身定做了帮助其继续“统治世界”的经济秩序。自此，这个“二战”中最大的获益者便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开始了其经济发展之路。

1945年	布局	1
1946年	摇摆的《就业法》	4
1947年	第三次革命与创新之源泉	6
1948年	第一次衰退与马歇尔计划	8
1949年	北约建立	11

20世纪50年代

伴随着和平，美国迎来了“二战”后的第一批“婴儿潮”，“婴儿潮”的到来不仅改变了美国个人消费市场，而且还为世界带来了引领IT革命的诸多领袖人物。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战后萧条再度让“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国内流行，政府由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并没有将私营企业挤出市场，相反却成为了信息革命的助力器。

1950年	韩战	15
1951年	意味深远的一年	18
1952年	“婴儿潮”	20
1953年	萨缪尔森	23
1954年	布朗判决	26
1955年	萧条、景气与危机	28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美国篇

1956 年	《全国州际和国防公路法》	31
1957 年	衰退与艾森豪威尔主义	33
1958 年	《小企业投资法》	35
1959 年	疲弱的制造业与贸易变局	37

20 世纪 60 年代

伴随着欧洲、日本经济的复苏，美国制造业的霸主地位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的贸易赤字也随之不断恶化；与此同时，越战和“伟大的社会”计划的执行导致政府支出激增，美国的财政赤字越来越无法弥补。在贸易、财政双赤字的压力下，美元的统治地位遭受到了质疑，一场“世界货币”的争夺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1960 年	第一次美元危机	43
1961 年	减税与新西部	46
1962 年	沃尔玛登场	48
1963 年	我有一个梦	51
1964 年	越战	53
1965 年	伟大的社会	56
1966 年	金融新疆界	58
1967 年	战时景气	61
1968 年	英特尔元年	64
1969 年	倒下的“挑战者”	66

20 世纪 70 年代

两次石油危机的发生将世界拖入了“滞胀”的泥潭，但是借助“迷雾重重”的石油危机，美国稳固了美元“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与此同时，在 IBM、微软、苹果、甲骨文等一批高科技企业的带领下，信息革命已经走进了普通人们的生活，一场新的变革正在发生之中。

1970 年	另一个“挑战者”	69
1971 年	特里芬难题与尼克松危机	72
1972 年	“外交家”与东方	74
1973 年	第二次美国革命	76

目 录

1974 年	阴谋	79
1975 年	阴谋Ⅱ与通胀	81
1976 年	芝加哥学派	83
1977 年	苹果们	85
1978 年	布局Ⅱ	88
1979 年	高利率时代	91

20 世纪 80 年代

年迈的里根和他的“里根主义”没有帮助美国在 80 年代真正走出经济不振的泥潭，但是他却利用一纸《广场协议》将日本的经济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更重要的是，就在这期间，美国和世界迎来了“掌舵”世界经济 10 余年之久的“经济教皇”——格林斯潘。美国正站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的废墟上，等待着自己重振辉煌的未来。

1980 年	第三次浪潮	95
1981 年	里根主义	99
1982 年	衰退中的强势债权人	101
1983 年	复苏、景气与新问题	104
1984 年	反垄断与科技扶持	106
1985 年	广场协议	109
1986 年	《格兰姆法》与再减税	112
1987 年	格林斯潘与企业家时代	114
1988 年	《1988 年综合贸易竞争法》	116
1989 年	挑战者再次登场	119

20 世纪 90 年代

在经历了 70 年代的布局和 80 年代的等待后，美国终于迎来了战后经济最辉煌的 10 年。就在美国享受高增长和低通胀的“新经济”时，一场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让所有人都体会到了美国“金融大鳄”们的可怕实力。而这些金融巨头们则在 90 年代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潘多拉的盒子在美国的金融界被打开了。

1990 年	老布什衰退与新希望	123
1991 年	第一智囊团	127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美国篇

1992 年	趋势与大选	130
1993 年	克林顿与信息时代	133
1994 年	金融改革与创新	135
1995 年	疯狂与反思	138
1996 年	网络泡沫与非理性繁荣	141
1997 年	隔岸观火	144
1998 年	合并、破产与“繁荣”	148
1999 年	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151

21 世纪

“9·11”事件和网络泡沫的破裂让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发生了变化。为了能够刺激经济复苏，格林斯潘开始了以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但是，在实体经济萎缩和虚拟经济膨胀的双重影响下，美国走上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所走过的资本泡沫之路。唯一不同的是，美国金融企业高超的“炼金术”帮助美国将更多的风险传递到了国外，而世界经济也在如海啸般袭来的美国垃圾资产的大潮中被全面带入了金融危机之中。

2000 年	破裂的网络泡沫	157
2001 年	多事之秋	160
2002 年	美国房市	163
2003 年	新格局	166
2004 年	债务帝国	169
2005 年	扁平世界中的热门商品	173
2006 年	改朝换代	175
2007 年	金融炼金术	178
2008 年	十年轮回	181
2009 年	危机蔓延与希望	184
2010 年	争锋	187
2011 年	事情正在起变化	191
2012 年	《2012》	195

参考文献 200

致谢 204



20 世纪

40 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需求不仅将美国的制造业水平提升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更是刺激美国的科学家们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计算机，这使得美国独自带领世界完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而美国的政治家们，则依靠美国军事、经济的霸主地位为美国量身定做了帮助其继续“统治世界”的经济秩序。自此，这个“二战”中最大的获益者便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开始了其经济发展之路。

1945 年 布 局

1945 年 9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天皇则宣布为“停战”），历时 6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争，欧洲、亚洲各参战国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人口大规模减少、生产设备被大量破坏。美国作为唯一一个本土未受战火蹂躏的战胜国，虽然战死了约 300 万人^①，但是其国内的生产能力被大大提升了。得益于海外的战争，美

^① 让·里瓦尔：《1945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6 页。

国的各类军用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这帮助美国拥有了战后全球接近半数的生产能力，美国成为世界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美国的实力不仅仅体现在生产能力上，战争中巨大的政府投入帮助美国拥有了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水平。截至 1945 年，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与开发项目上的总支出达到 13.136 亿美元，同时国防部研究费用也达到 4.236 亿美元。^① 美国不仅成为当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时战时项目的科研成果也成功向民用转化，如改善雷达系统的微电子技术刺激了战后电子产业的技术进步，合成橡胶技术的进步刺激了美国的化学和石化产业的发展，战时治疗传染病方面广为应用的青霉素刺激了医疗用抗生素的发展等。

作为世界经济、科技最强的一极，美国并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那样通过重新划分殖民地来控制世界，而是通过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方面的“布局”，为其在战后一直保持优势的国际战略地位做好了铺垫。

1944 年 7 月，44 个国家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并制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 35 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的国际货币原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被赋予了与黄金相同的权力，各国间货币汇率稳定，这一方面有助于促进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帮助美国确立了美元的全球霸主货币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下，美元成为全球唯一具备“铸币税”的货币。

铸币税，英文为 Seigniorage，是从法语 Seigneur（封建领主、君主、诸侯）演变而来的，又称铸币利差。在中世纪欧洲，各国统治者会对送到铸币厂制造货币的金银等贵金属征收一定的税赋，这一税赋即被称为铸币税。之后君主通过减少铸币重量、降低铸币成色等方法，使铸币的币面价值高于其真实价值，币面价值与真实价值的差价也成为发行政府的铸币税所得。在现代社会中，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使得美国政府获得了在全球范围内收取铸币税的权力。美国政府通过印制美元，使得美元贬值，这就会减少所有持有美元货币的持币者所拥有的财富。从今天看，美国利用这一特权一直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势，曾经的日本、德国和今天的中国都因为美元的霸主地位

^① 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91 页。

20世纪40年代

位而交出了巨额的“铸币税”。

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精神，1945年以美国为主导创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与10月成立的联合国一并，这些组织为美国战后在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张提供了便捷的平台。

“二战”后美国没有选择通过传统的殖民地模式来扩张势力范围，而是通过其强势的军事、经济实力来推进美元的国际化和制定战后经济、金融、贸易格局。这样的格局看似难以获得既得利益，甚至也成为美国之后贸易巨额逆差的原因之一，但是其具有深远的意义。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与1945年相比虽然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但是整体的模式依然处于美国1945年时所制定的框架内。

从美国国内来看，战争的结束直接影响了美国企业产品的需求，价值350亿美元的战争合同在日本投降后全部取消，美国国内经济面临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艰难转型。虽然随着战争的结束，大量军需品需求骤减，但是1945年和其后的几年中，美国并未出现人们想象的战后萧条和由于复员军人回国导致的失业率激增。主要原因是由于战时美国的消费品供不应求，美国居民在战争时期的消费需求被大大抑制，战后消费者需求的迅速增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需订单的减少。

同时，美国于1944年通过了《兵役调整法》，该法规定为退伍军人提供经济援助和就学资助，大量退伍军人选择进入大学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复员军人集中就业所带给社会的压力并增加了社会中的消费需求。《兵役调整法》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在战后短期内刺激了国内消费和缓解了就业压力，对美国社会、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批黑人因为“二战”的机会而进入城市，并且成为城市中一股新生社会力量，这股力量随着接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在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了其追求平等权力的运动。可以说，“二战”中黑人在城市工业部门中就业人数的增加为之后美国发生的人权运动埋下了伏笔，“二战”成为美国黑人改变被歧视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①

消费者需求的剧增确保了美国战后没有出现经济萧条，更准确地说，激

^① 美国黑人命运发生转变的第一个转折点是1862年宣布的《解放黑奴宣言》。